

何方生 陈洪鶴 崔 岩 主编



福建省南下服务团团史研究会  
第三次团史理论研讨会论文集

海峡文艺出版社

# 献 身 之 歌

——福建省南下服务团团史研究会第三次团史理论研讨会论文集

何方生  
陈洪鹗 主编  
崔 岩

海峡文艺出版社

(闽)新登字 05 号

### 献身之歌

——福建省南下服务团团史研究会第三次团史理论研讨会论文集

何方生 陈洪鶴 崔岩 主编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东水路 76 号 邮编:350001)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州市南方彩色印刷公司印刷

(福州市福新路 131 号 邮编:350011)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6.75 印张 2 插页 160 千字

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500

ISBN 7-80640-157-1

I·1052 定价:8.5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 目 录

|                         |             |
|-------------------------|-------------|
| 为福建妇女的彻底解放奉献终身          | 尹 峰 汪涵青等(1) |
| 南下服务团战友在福建人民贸易事业的初创时期   |             |
| 战斗在福建青年工作战线的南下服务团战友     | 王志刚(24)     |
| 活跃在福建体育战线上的南下服务团战友      | 卓 如(37)     |
| 在厦门军管会卫生处的日子里           | 王永维(44)     |
| 从时代特点看两代青年的不同追求         |             |
| ——兼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问题 |             |
| 现代史中第三代青年学生运动的发端和特征初探   |             |
| 南下服务团的特性及其成员的特点         | 芦 苇(66)     |
| 尊重历史 实事求是               |             |
|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上海学生运动的胜利之本    |             |
| ——兼析上海学生运动和南下服务团        | 陈其明(96)     |

## 从自发的爱国主义到自觉的马列主义

- 浅谈南下服务团成员的思想基础 ..... 华金山(113)
- 浅谈“本土”文化的熏陶和影响 ..... 单克能(122)
- 论南下服务团团史的意义和作用 ..... 郑永华(126)

## 寻找立足点

- 关于道路的再回顾 ..... 姚开元(151)
- 南下服务团精神的成长与思考 ..... 傅远南 孔令原(158)
- 试析年华无悔 ..... 朱振隆(166)
- 论南下服务团成员人生观的形成 ..... 朱奇镜(174)

## 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

- 略论南下服务团思想作风 ..... 贺群立(183)
- 南下精神与关心下一代初探 ..... 陈家珏(189)
- 老同志的忧患与使命 ..... 归 纳(197)
- 对吸收年轻一代参与团史研究的思考 ..... 刘 劲(204)

## 福建省南下服务团团史研究会第三次团史理论研讨会综述

- ..... 何方生(208)

## 为福建妇女的彻底解放奉献终身

尹 峰 项爱月 崔维洁 汪涵青  
黄定文 晋月娥 郑惠霖 黄右铭

1950年初，省委决定成立省委妇女运动委员会（简称省妇委），进而筹建省民主妇女联合会（1957年改称省妇女联合会）。省妇委刚成立时，仅有苏华、路凯、于晶三位领导同志，她们急需选调一批妇女干部充实机构、开展工作。根据当时福建的干部队伍情况，她们的目光自然落在不久前从上海来的南下服务团女同志身上。

那时，正好福建省革命大学第一期即将结业，在革大工作的南下服务团同志也将重新分配。省妇委副书记路凯就找到了革大负责同志伍洪祥和曾鸣，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同时又在新闻出版部门物色，终于在1950年3月前后，我们18人（其中党员11人，大专学历14人）走上了福建的妇女儿童工作岗位。省妇联筹委会成立时，南下服务团女同志占总编制数的半数以上。先后共有28位南下服务团女同志在省妇联工作过。另外，在各地、市也有一批南下服务团的女同志参加妇女工作。全省约有40多位南下服务团的女同志从事过妇女工作，其中有12人为福建妇女的彻底解放奉献终身，有8人获得了全国妇联授予的“为妇女解放事业作出积极贡献”的荣誉证书。

## 决心为福建妇女的彻底解放献身

刚开始做妇女工作时，我们都是20岁左右的未婚姑娘，对“妇女”二字，感到有点刺耳，更不知妇女工作是干什么的，社会上和党内也有轻视妇女工作的倾向。我们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到省妇委的。

一到工作岗位，面临的任务是全力准备全省妇女工作会议，成立省民主妇联筹委会。那时，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法令《婚姻法》刚刚颁布，各地送来的材料，绝大部分是反映婚姻家庭方面问题的。我们从大量触目惊心的材料中受到了震撼，了解到福建广大妇女，尤其是农村劳动妇女遭受封建主义婚姻制度的深重迫害。她们不仅普遍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和强迫买卖婚姻的束缚，许多女童受买卖婚姻派生出来的“童养媳”、“等郎妹”现象的煎熬；在闽东北，还有闻所未闻的租妻、典妻、合妻；在惠安县东部妇女有长住娘家的陋习，进而酿成集体自杀的悲剧；在部分山区又有婚姻不自主而发生男女关系混乱的反常情况。同时，男尊女卑，妇女在家庭受虐待遭殴打及大量女婴被溺死等等。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各方面，远未获得平等。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指出的：中国男子普遍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政权、族权、神权；至于女子，还要受夫权的支配。由此，我们领会到一首歌谣所说的：“……黑格洞洞的枯井万丈深，井底下压着咱们老百姓，妇女在最底层……”

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推翻了三座大山，解放了全国人民。我们正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高潮中投身革命，怀着解放南方的崇高目的到福建来的。而福建广大妇女还在万丈枯井最底层，我们这批已经获得自身解放的女孩子，义不容辞地要为她

们奔走呼号。从而，很快排除了我们的思想障碍，奠定了为福建妇女的彻底解放而献身的决心。

### 在实际工作中锻炼成长

在文革前的十多年间，妇女工作的重点一直在农村，在各项中心运动和生产活动中，贯彻男女一齐发动的方针，采取蹲点带面的方法，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在发动妇女参加政治活动和社会劳动中，针对妇女特点，结合解决妇女的特殊问题，逐步争取男女平等。

我们是从土地改革运动开始农村妇女工作的。1950年冬至1951年春，土改试点在全省展开，省妇联筹委会除留下五、六人坚持面的工作外，全部下乡。在苏华、路凯、张昭娣等同志的带领下，分赴闽侯荆溪、关口、黄山和莆田黄石等地参加土改。我们吃、住在贫下中农家，帮助贫下中农姐妹烧火、煮饭、抱孩子、打扫院落。白天随她们下田劳动，晚上或雨天，同她们聊天交朋友，讲阶级斗争故事，教她们识字学文化。发动群众，让苦大仇深的妇女起来诉苦，上台斗争地主、恶霸。土改斗争的实践证明，凡是妇女上台诉苦，都能声泪俱下，激动人心，达到启发广大贫下中农阶级觉悟的目的，顺利进行分田地、分浮财等一系列活动。我们强调妇女同样分得一份土地；在颁发土地证时，强调必须写上妇女的名字，有的要单独发给土地证，树立男女平等，当家作主的思想。既保证土改任务的完成，又提高妇女的社会、家庭地位。同时，结合土改，发现妇女积极分子，培养妇女干部，建立妇联的基层组织——妇女代表会，为妇女工作的开展，打下初步基础。

参加上改，不仅是工作需要，也是培养我们的阶级感情，启发我们的阶级觉悟和站稳阶级立场，改造我们的世界观。我们都

来自上海的大、中学校，绝大部分从未去过农村，尽管经历了南下行军的磨练，但真正到农村去，到妇女群众中去，仍面临着许多难题。在土改中，通过扎根串连，访贫问苦，同贫下中农妇女同吃、同住、同劳动，对我们的思想感情、生活习惯进行着艰苦的改造。我们努力学习当地方言，学习赤脚走田埂，学习上山下田干农活，锻炼黑夜独自走山路，还要经受狗吠、蛇咬的惊吓以及跳蚤、蚂蟥、老鼠的骚扰。我们手脚起泡，肩头红肿，棉被沾满了跳蚤血。有一位同志在睡梦中被老鼠钻进了内衣，有一位同志在枪枝走火中负了伤。我们把这一切都看作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劳苦大众相结合的必由之路，以苦为乐，坚守岗位。

同样地，在以后的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一系列中心运动中，在城市的三反、五反，手工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我们一如既往，身体力行，继续坚持下乡下基层，在完成党的中心任务的同时，积极贯彻“以生产为中心”和“勤俭建国，勤俭持家，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妇运方针，在不断深化自我改造中做好妇女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反复多次的宣传贯彻《婚姻法》。正因为福建广大劳动妇女遭受封建婚姻压迫特别深重，我们的工作也分外艰苦。我们曾到过各种不同类型的地区进行调查研究，撰写过大量宣传材料，具体接待处理过无数婚姻家庭纠纷。1953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中，我们曾全力投入，还多次集中力量到惠安县净峰、小岞等地搞点，试图改变惠安部分沿海地区妇女长住娘家的陋习，制止集体自杀悲剧的重演。但由于封建婚姻制度根深蒂固，几十年中，包办买卖婚姻仍然多次回潮，我们这一代妇女工作者曾与之进行反复较量。现在，某些婚姻陋习已经基本改变，使我们深受鼓舞。当然，斗争仍将是长期的。

妇联是党联系妇女群众的纽带，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及时

向党委反映妇女群众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和妇女工作的经验教训是妇联的重要职责。在几十年的工作中，我们进行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利用我们的文化优势，撰写过许多调查报告。除上面已提及的有关婚姻问题的调查外，还有农村妇女和城市女工的劳动保护情况；困难时期妇女患闭经，子宫脱垂，儿童患小儿佝偻病的情况；妇女统一战线工作情况；儿童少年情况及托幼园所情况等调查。其中有关女工劳动保护，妇女统战工作，福州市东街儿童少年情况，以及厦门集美幼儿园情况等调查报告，曾受到省委和全国妇联的重视和肯定。我们也从这些调查中，提高了自己的分析能力和业务水平。

### 正确处理工作和家庭的关系

我们初到妇联，领导同志就谆谆教导我们，要正确处理婚姻家庭问题，实行晚婚节育（当时国家尚无此政策，50年代初还宣传过苏联的“母亲英雄”）。她们说一个女同志脚跟还没站稳就别忙结婚，想要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就得处理好工作和家庭的矛盾。我们从日常接触中，又了解到不少老妇女干部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生了孩子，又不得不舍弃了孩子；刚刚分娩就继续行军等等。有的同志为了革命需要，把两个孩子都送进了帝国主义办的育婴堂而死于非命；还有个同志在日本鬼子扫荡时，为了保证乡亲们的安全，把自己一个啼哭的婴儿闷死在怀中。这些感人故事，使我们深受教育，激励我们始终把工作放在首位。

因此，我们都能慎重对待恋爱、婚姻和家庭。我们都在25岁以后才结婚，都只有二三个孩子。

妇联都是女同志，谁也无法照顾谁。怀孕，带孩子，都照样要下乡。有的带了七八个月的身孕下乡，有的经过长时间汽车颠簸，回到家中或发生先兆流产，或已停止了胎动。我们年龄相

仿，结婚，生育，几乎都集中在那几年。为了工作，有的在月子里就开始写材料，参加会议，不少人没有休满 56 天产假，就回到工作岗位。那时妇联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自己不能哺育孩子。因此，大部分同志都只好从微薄的供给制津贴中挤出钱来雇奶妈（50 年代尚有此条件）。经济上有困难的，就得带上孩子保姆下乡。有一位同志分娩才 42 天，就带上保姆，挑上一担婴儿和衣物到农村蹲点。

我们经常下乡，或是参加党的中心工作，或是调查研究，或是长期蹲点，一般每年下乡都在 4~8 个月。我们几乎人人都参加过 60 年代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有的连续搞了二三期，一去两年多；有的直到文革开始后的 1967 年才回来。这样，自然无法照顾到家庭和孩子。我们几乎没有因为丈夫、孩子生病或家中有事而从乡下赶回，甚至丈夫、孩子住院手术也没有亲自陪同照料。另一方面，当时妇联组织确实为我们解决了不少后顾之忧。省妇联自 1955 年起创办了机关托儿所，1958 年后办了全托和娃娃班。我们的孩子无一例外地都进了全托。60 年代后孩子们陆续上小学，托儿所又附设了小学辅导班，不仅保证三餐伙食，放學回来，还有老师辅导督促做作业。孩子生病都由托儿所保育员带往医院治疗，住院一般也由托儿所保健员陪同，从而保证了我们全力投入工作。我们由衷地感谢当年托儿所、辅导班的保教人员；同时也感谢爱人的理解和支持。多少年来，我们的家庭总是聚少离多，用一句时髦的话说，当年我们欠丈夫、孩子很多很多。但是我们的家庭都很美满幸福，如今两鬓霜白，夫妇间仍能相濡以沫；孩子们均已成家立业，在改革开放中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我们深切地感到，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为理想信念而奋斗，虽苦犹甜；作为妇女工作者，特别需要有一种献身精神。

## 为福建的儿童保教事业奠基

儿童工作历来是妇女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省妇联一直设有妇女儿童福利部。有一段时间曾以儿童工作为全会工作的重点，并专设儿童工作部。省少年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也设在省妇联。

1950 年省妇联筹委会成立不久，就根据省委书记张鼎丞同志的指示，为解决大批供给制干部的后顾之忧和烈士子女的寄宿教育问题着手筹建省儿童学园。当时，我们这批人中，有一部分是上海国立幼稚师范专科学校的学生。由于专业对口，省妇联想方设法将幼专学生尽量调入妇联，幼专南下共 14 人，先后有 9 人在省妇联工作过。有的分配在福利部，有 4 人直接参加了省儿童学园的筹建工作。

解放初期，福建的儿童保教事业基础十分薄弱。在张鼎丞同志的重视和支持下，省妇联挑起了兴办儿童保教事业的重担。这副担子又责无旁贷地落在我门这批人身上。当时，正好华东局拨来一笔干部子弟保育补助费，就用这笔钱作为基金，在省、地（市）两级创办全日制托儿所（包括一部分寄宿制小学）。我们积极从配备保教人员，购置设备等方面协助地、市妇联开展工作。一方面从福州女师幼教班调入毕业生；一方面从社会上招收女青年，开办保育员培训班，为儿童学园和各地（市）托儿所、幼儿园充实师资力量。这批人后来都成为福建幼教事业的骨干。土改之后，根据当时的实际需要，我们又着手农村托幼工作试点，以亲邻相帮、个别寄托和农忙托儿组等多种形式，解决妇女参加劳动和抚育子女的矛盾。并亲手创办了福建第一个农村托儿所。在文革前后的 20 多年间，福建的托幼事业，经历了曲折，托幼园所被诬为“培养修正主义苗子”，几乎全部摧毁。文革后，拨乱

反正，特别是 1979 年全国、全省托幼工作会议后，总结了经验教训，提高了对儿童早期教育的认识，明确了托幼工作是智力投资的基础工程，贯彻了恢复、整顿、巩固、提高的方针，儿童工作终于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1981 年，为了贯彻中央 19 号文件精神，我们在全国妇女工作会议上提出要为福建儿童办 12 件实事（办好两个示范性幼儿园和两所幼儿师范，创办儿童医院，儿童公园，儿童图书馆，儿童电影院，扩建妇幼保健院，建立儿童基金会等），在全国范围内有一定的影响。当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卫生报》以及《求实》杂志均以头版或显著版面报道了这一消息。在省委的重视和支持下，发出了闽委〔81〕33 号文件，我们从调查城乡儿童状况入手，做了大量协调工作，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协助有关部门落实，经过这十几年的努力，现已基本完成。儿童的精神食粮、生活用品玩具等都有很大的发展。福建儿童工作得到后来居上的好评。省实验幼儿园和儿童保育院均为一类示范园所，省实验幼儿园还被评为优质幼儿园。

1982 年，配合教育部门，在幼儿园、小学，乃至部分中学自下而上建立了家长学校，成立家庭教育研究会，发挥专家、学者的才能，编辑出版了多部家庭教育的书籍，指导家长树立德育为主、为国教子的观念，提高了家长的素质，涌现了许多好家长。省家庭教育研究会被评为先进学会，我们中有 3 人获得了全国家庭教育工作“园丁奖”。

在省儿童学园初建之初，曾历尽艰辛。参加筹建的同志，具体肩负了从一砖一瓦基本建设，设备购置，编写幼儿教材，制订教育规划到培养师资骨干等各项工作。既负领导责任，又做具体教学工作。当时，我们初出校门，年轻缺乏实践经验，加上儿童学园是全日制寄宿园所，精神压力很大。那时，敌机常来空袭，福州又没有空防设备，大家经常是和衣而睡，闻声而动，一有警报，立即起床疏散儿童。在传染病流行期间，孩子们不放假，工

作人员也不能外出，有时几个月没有走出园门。现在，儿童学园已成为全国十佳幼儿园之一，我们倍感欣慰。多年来，我们为福建儿童保教事业的奠基倾注了大量心血，终于结出了硕果。

弹指一瞬间，我们这批从 50 年代开始从事妇女儿童工作的年轻姑娘，均已步入暮年。同其他岗位的同志一样，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也经历过风风雨雨。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在 50 年代末接受过下放劳动锻炼。文革中，有的长期被审查，有的进过“牛棚”，有的因而致伤致残，后来又都下放农村多年。但正如原省委书记贾庆林同志在纪念南下服务团入闽 45 周年大会上所说的，我们是“团结战斗的一代，无私奉献的一代，自我牺牲的一代”，始终无悔无怨。尽管在个人没有作出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但今天回首往事，心里很踏实，为没有虚度年华而自豪。在 80 年代，我们陆续离开了工作岗位，但仍然关注着福建妇女的解放和儿童事业，这是我们为之奋斗终身的事业！改革开放十多年来，福建妇女运动取得了日新月异的成就，全省广大妇女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大量妇女参政议政，涌现了许多女企业家和女强人。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各方面的地位不断提高。我们曾是福建妇女运动的铺路石，对今天福建妇女运动的成就，感到无比欢欣鼓舞。

执笔：汪涵青

1997 年 4 月 2 日

## 南下服务团战友在福建人民 贸易事业的初创时期

金凌 王业贯 姚颂先 田治

徐汛 汪公良 曾哲

1949年10月，南下服务团战友100人分配到福州贸易局，随即转分配全省各地市国营贸易公司，连同由各地市委分配到贸易战线的战友，总计130多人从事贸易工作。战友们在老干部的带领下，团结其他工作人员，坚决贯彻党的新区政策和城市工作政策，在一个陌生的领域——经济战线，披荆斩棘，进行了艰苦而卓有成效的斗争，成长为开创福建人民贸易事业的第一代骨干力量。回首回顾，当年青春闪光的亮点，仍然激励着我们的晚年生活。

### —

解放初期，旧政权遗留给福建人民的经济千疮百孔，生产萎缩，商品奇缺，百业萧条。城镇失业人口众多，投机资本乘机捣乱市场，哄抬物价，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战争状态还没有结束，支前任务十分繁重。党和人民政府除抓紧打击残余反革命势力，稳定社会秩序外，立足于启动经济，以发展生产，稳定人心，支援前线。因而十分重视发挥商业部门在控制战略物资，稳定市场物价，促进工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当时，广大城乡市场主要为私营和个体商业占领，农村供销合作社还未建

立，国营商业刚在若干中心城市建立了机构，正迅速开展业务，迫切需要增加干部力量。南下服务团战友在这一形势下，走上了工作岗位。

我们绝大多数战友初出校门，对商业工作完全陌生，但这支队伍具有良好的素质，有较高的文化和一定专业知识，普遍受过大专教育，曾就读于国际贸易、工商管理、运输管理、会计、建筑、纺织等经济类或工程类专业，极少数社会青年也曾做过经济工作，更重要的是有一股革命热情。在艰苦磨练中，逐步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和革命人生观，从而使我们迅速熟悉了业务和经营策略。当时，各地国营贸易公司的组织状况，一般是由南下干部、地下党的老同志担任领导，南下服务团战友则是承担主要业务工作的骨干。以解放初期福州、厦门、泉州、南平四个中心城市贸易公司为例，服务团战友一般占总人数 60% 到 70% 左右。许多战友在公司本部从事几个月的业务工作后，就跟随老同志甚至独立负责到主要县城和中心集镇建立营业组，开辟农村市场，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全省第一批县级贸易公司，又再扩展新的地域建立新的机构。一二年中，全省贸易机构和队伍迅速扩大，战友们纷纷担任了基层领导工作。那不是当官，而是意味着担子挑得更重，承受的艰苦锻炼更多了。在公司本部从事管理业务的战友，同样经历了各种艰难困苦，配合完成了中心任务，打下了各项管理工作的基础。总之，在经济恢复时期，为保障城市供给，平抑物价，打破敌人封锁，促进内外交流，支援前线，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战友们都作出了无私奉献，无愧为福建人民贸易事业开拓者、创业者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就福州、泉州、南平三地战友们的经历作个回顾和剖析，从中可见全省贸易事业发展壮大过程中，战友们融入的心、血、汗及其力量的来源。

## 二

战友们在经济恢复时期，参与完成了人民贸易事业的主要任务是：

（一）保障城市供给，稳定市场物价

解放初期，稳定物价，支持人民币占领市场，是贸易战线的首要任务。为此，战友们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

1. 掌握粮源，保证城市粮食供应。

民以食为天，物价波动以粮价带头，收购粮食是国营贸易公司与奸商囤积居奇，杀价抬价、操纵市场等不法行为作斗争的主要阵地。南平、福州、泉州的袁祥音（已病故）、王业贵、金梦肃、周易、朱琢如、石家勤、林天辉等许多战友，奉派到粮食主要集散地洋口（属顺昌县）、沙县、尤溪、长乐、闽清、罗源、永春等十多个城镇，建立营业处（组），把收购粮食与供应工业品结合。通过公平交易，服务周到，价格合理以及灵活机动的斗争策略，战胜了私商，成为市场主导力量，收购了大批粮食。当时收购粮食是十分困难的：一是土匪的骚扰；二是人民币很难下乡，主要因农民很难以人民币换回所需的东西。为此，就必须配合做好肥料、食盐和日用工业品的运销，保证农民所得的人民币能够买到必需的工业品。战友们在当地政府支持下，利用祠堂破庙，二三天内搭起架子床就开秤，营业。战友们既管收购，又管仓库，既要过秤，又要堆码，每包 120~160 斤重的大米，有时还得自己扛。白天营业，晚上守卫仓库。霉雨季节，翻晒豆饼、布匹，这些繁重的体力劳动都亲自干。当时基层的贸易公司处于半军半商状态，服务团战友同南下老干部一样，都配有长短枪、手榴弹等，晚上枕枪而卧，遇有紧急情况，天一黑就关门上锁带着武器守在民房楼上，防备敌情。特别是闽北地区的匪情较为严